

美国法律文库

THE AMERICAN LAW LIBRARY

伯纳德·贝林 著
Bernard Bailyn

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原书增订版)

涂永前 译

THE AMERICAN

LAW LIBRARY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原书增订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美)贝林著;涂永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620-3050-8

I. 美... II. ①贝... ②涂... III. ①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研究
②政治思想史-研究-美国-1775~1783 IV. K712.41 D097.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4864号

书 名 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

出 版 人 李传敢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北京100088 信箱8034分箱 邮政编码100088

zt5620@263.net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58908325(发行部) 58908285(总编室)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规 格 787×960 16开本 24印张 425千字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0-3050-8/D·3010

定 价 39.00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本社发行科负责退换。

本社法律顾问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译者序

《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American Revolution*)是一本精深的著作,是真正的大师级作品,是所有研究美国革命史、政治哲学以及法律思想史的学者的必读书籍。

尽管该书是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推出的,但是它对人们该如何理解美国革命具有革命性的影响。40年过去了,但该书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萎缩。可以说,从本书首次推出一直到现在,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学识及其在书中所展示的阐释技巧长久以来都令人兴奋不已。因为,他通过该书全面地改变了我们的看法,让我们意识到是广大的民众创造了这段历史。

该书一推出就获得1968年美国历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the Bancroft Prize)^[1]以及同年度的普利策历史图书奖(the Pulitzer Prize for History)。本书初版于1967年,一出版就在史学界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关注,影响巨大。有心的读者可以在Amazon.com中键入本书英文书名,就会发现:近40年过去了普通读者的热情评价还是那么的多,并且总是充满了溢美之词。如果您有兴趣,还可以在其他的英文学术网站上进行检索,就该书所发表的书评也是蔚为可观。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研究美国革命思想历史的专著,但是其中的研究进路,对史料的挖掘、处理,对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法律思想研究、宪政学说研究以及未来的政治制度设计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普遍参考价值。

从互联网上查询到的信息来看,国内除了美国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 班克罗夫特奖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根据已故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Fredric Bancroft, 1860年~1945年,出生于伊利诺伊,曾就读于著名的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遗愿于1948年设立,一年颁发一次,参评作品必须是前一年度出版的在美洲史研究(包括传记作品在内)以及外交研究方面具有杰出成就的英文著述,这些著述可以是公开出版的英文原著,也可以是其他语言翻译成英文的,也可以是著名美洲人士所发表的论文、书信以及演说词的文集,但必须是由该作者自己编辑的作品。该奖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参评作品不一定要与哥伦比亚大学有什么联系,也不一定是美国公民才可以参评,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可以参与公平竞争。以上内容根据 <http://www.columbia.edu/cu/lweb/eguides/amerihist/bancroft.html> 以及 <http://www.answers.com/topic/frederic-bancroft> 编译整理。

2 译者序

李剑鸣先生^[2]对伯纳德·贝林教授的著作进行过较多研究外，其他人对伯纳德·贝林教授的研究及具体生平了解甚少，有鉴于此，以下将就本书作者贝林教授个人经历以及学术道路，各界对贝林教授的评价，本书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以及评价逐一简要说明。

一、伯纳德·贝林其人其事

伯纳德·贝林1922年出生于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Hartford, Connecticut）。“二战”期间曾在军队信号军团（Army Signal Corps）以及军队安全机构（Army Security Agency）服过役。1945年在威廉斯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BA），1947年、1953年在哈佛大学分别获得文学硕士学位（MA）、哲学博士学位（Ph.D.），从此就与该校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研究生导师为哈佛著名学者 Perry Miller, Samuel Eliot Morison 以及 Oscar Handlin。其学术经历大致如下：

1953年开始执教哈佛大学；

1961年成为哈佛大学全职教授；

1966年~1981年任温斯罗普历史学讲座教授（Winthrop Professor of History）；

1967年，获得第一届伊曼纽尔学院罗伯特·H·罗德奖（Robert H. Lord Award of Emmanuel College）；

1962年~1970年任《约翰·哈佛文库》（the John Harvard Library）总编；

1967年~1977年，1984年~1986年，曾两度出任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刊物的副主编；

1971年任剑桥大学 Trevelyan 讲师，1986年~1987年任剑桥大学皮特美国史教授（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History），在剑桥他被授予基督学院荣誉研究人员（Honorary Fellow of Christ's College）头衔；

1981年成为第一任亚当斯大学教授（Adams University Professor）；同年，出

[2] 李剑鸣，美国史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同时兼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多年来，他一直在从事美国史的研究工作，涉及的领域包括美国早期史、社会政治史、种族关系史，其成名作《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界，同时还引起了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学者的关注，其他代表著作有：《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美国的奠基时代》（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与政府改革》（合著，主编之一，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另外还有大量论文、评论，他对美国文化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历程所做的研究在学术界拥有广泛的声誉。李剑鸣先生对伯纳德·贝林教授的史学研究体现在“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在准备翻译本书之前，译者在网上查得李教授的联系方式（当时李教授还在南开大学执教），请教李教授有关翻译时必须读的相关书籍，李教授迅速发来电子邮件，推荐了几本参考书籍，在此译者向其表示感谢。

任美国历史研究会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主席;

1983 年~1994 年, 出任查尔斯·沃伦美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the Charles Warren Center for Studies in American History);

1989 年~1994 年, 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受托人 (Trustee of the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93 年任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 同年, 他还获得了托马斯·杰斐逊勋章 (Thomas Jefferson Medal);

1994 年获得美国哲学学会亨利·艾伦·莫奖 (Henry Allen Moe Prize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5 年, 澳大利亚拉卓比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曾以他的名字开设了北美历史讲座系列课程;

1998 年, 美国人文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任命他为杰斐逊讲师 (Jefferson Lecturer); 同年, 因为他为大西洋世界历史国际研究会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 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还获得对外政策协会 (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奖章;

2000 年, 应克林顿总统及其夫人的邀请在白宫发表了新千年演讲; 同年, 获得美国历史学家协会颁发的布鲁斯·凯通终身成就奖 (Bruce Catton Prize of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Historians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2001 年, 获得哈佛艺术和科学研究生院百年奖章 (Centennial Medal of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2004 年, 获得马萨诸塞历史学会肯尼迪奖章 (the Kennedy Medal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伯纳德·贝林教授现任哈佛大学亚当斯大学讲座教授以及詹姆斯·菲利普早期美国史荣誉教授 (James Duncan Phillips Professor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emeritus*)。同时还兼任学者协会 (the Society of Fellows) 资深学者 (Senior Fellow) 以及大西洋世界史国际研究会主任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 他还是美国文艺与科学研究院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成员、美国哲学学会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会员以及国家教育研究院院士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英国研究院通讯院士 (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皇家历史学会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会员, 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Foreign Member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欧洲科学院 (Academia Europaea) 院士以及墨西哥历史和地理研究院 (the Mexican Academy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院士。世界很多著

4 译者序

名大学^[3]还给他授予了古典文学博士学位 (L. H. D.), 多所大学^[4]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Litt. D.)。

伯纳德·贝林教授的研究领域为早期美国史、美国革命以及美英工业革命前期的历史。他一生创作力旺盛, 著述颇丰, 当然相比较其他史学大师如艾伦·内文斯 (Allan Nevins) 以及菲利普·S·方纳 (Philip S. Foner), 贝林教授的作品产量还算不上什么, 但当时贝林教授的著作质量上乘、影响巨大。通过下述清单及注释读者就可以有所了解: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55 年);

Massachusetts Shipping, 1697 ~ 1714 [1959 年, 与洛特·贝林 (Lotte Bailyn) 合著];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1960 年);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7 年, 即本书);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1968 年);

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 (1974 年, 本书获得 1975 年国家图书奖);

The Great Republic (1977 年, 合著);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1986 年);

Voyagers to the West [1986 年, 本书获得普利策历史图书奖、移民史学会萨鲁陀斯奖 (the Saloutos Award of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Society), 殖民战争协会 (the Society of Colonial Wars) 以及辛辛那提 (the 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 学会杰出图书奖];

Faces of Revolution (1990 年);

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 (1994 年);

To Begin the World Anew (2003 年);

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 (2005 年)。

他还曾主编、编辑过以下图书:

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5 年已出版第一辑, 当年该书就获得哈佛大学出版社教授奖 (Faculty Prize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e Apologia of Robert Keayne (1965 年);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 1960 (1969 年);

[3] 这些大学主要有: Lawrence University, Bard College, Clark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Grinnell College, Trinity College, Manhattanville College, Dartmouth Colle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4] 这些大学主要有: Williams College, Rutgers University, Fordham University,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and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Law in American History (1972 年);

The Pres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80 年);

Strangers within the Realm: Cultural Margins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1991 年);

Debate on the Constitution (1993 年, 两卷本);

贝林教授一生育人无数, 在哈佛大学他就指导了 60 余名博士研究生, 并且大多成就卓著, 他培养的学生数量在他同辈历史学家中绝无仅有。其培养的博士生中成就卓著者主要包括普利策奖得主杰克·N·拉克夫 (Jack N. Rakove)^[5], 戈登·S·伍德 (Gordon S. Wood)^[6], 还有普利策奖最后入围者玛丽·贝思·诺顿 (Mary Beth Norton); 班克罗夫特奖得主罗伯特·格罗斯 (Robert Gross), 爱德华·康特里曼 (Edward Countryman) 以及理查德·L·布什曼 (Richard L. Bushman)。贝林教授培养的其他著名学者还有加里·B·纳什 (Gary B. Nash), 著有 *The Urban Crucible*; 迈克尔·朱克曼 (Michael Zuckerman), 著有 *Peaceable Kingdoms*; 波林·迈尔 (Pauline Maier), 著有 *American Scripture*; 詹姆斯·亨利塔 (James Henretta), 著有 *Families and farms: Mentalite in Pre-Industrial America*; 迈克尔·坎曼 (Michael Kammen), 著有 *The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以及多产的法律史学家彼得·查尔斯·霍弗 (Peter Charles Hoffer), 著有 *Law and People in Colonial America*; 等等。他培养的每一位历史学者都在美国的一些精英大学 (如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等) 的历史系工作, 不断培养出新一代北美殖民时期方面的历史学家。

二、业界对贝林教授及其研究的评价^[7]

伯纳德·贝林教授以细节研究以及对传统观点做出具有颠覆性的解释而闻名学术界, 特别是他对美国革命的起因和影响方面的研究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他指出共和主义 (republicanism) 是美国人民奋斗的核心价值所

[5] Jack N. Rakove, *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Alfred A. Knopf) (1996 年获普利策奖), 中文书名: 《宪法的原始内涵: 美国制宪中的政治与理念》(本书已经列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美国的历史与文明”系列丛书, 将在 2007 年出版), 该书主要叙述了美国宪法制定和通过的全过程, 包括制宪会议的政治背景、麦迪逊的议程、会议上的斗争与妥协、宪法制定与通过的程序, 并研究了关于宪法理论的四个主要论题: 联邦制度、权力分割、代表制度和权利问题。

[6] 戈登·S·伍德, 其著作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于 1993 年获得普利策历史奖, 而另一本书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 ~ 1787* 则获得了 1970 年的班克罗夫特奖。

[7] 本部分主要参阅了 Edward Shapiro, *A historian's historian-Bernard Bailyn demonstrates once again why he is America's most trenchant historian* (To Begin the World Anew: the Genius and Ambiguitie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Book Review) 中的部分内容。具体参见 <http://www.questia.com/PM.qst;jsessionid=GnGGC46ZnvrHBCZL5nMqJblChMsVJHrq8jbpRGWxqmVdCbhZhy4B!563139106!160033873? a = o&d = 5002541353>。

6 译者序

在；他通过大不列颠这个更为广泛的政治架构，指出了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所在，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就可以发现，英国辉格派人士在市民德性（civic virtue）、腐败、古代人的权利、当代人的权利以及对独裁统治的恐惧等方面的观点是如何在北美殖民地转化为共和主义思想意识的。贝林教授近些年来对大西洋世界历史的研究也是贡献卓著。1995年以后，他还在哈佛组织举办了一个每年一度的国际论坛，主要是推广大西洋世界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

在过去50年里，伯纳德·贝林当属殖民时期美国史方面最为卓越的专家。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比曼（Richard Beeman）教授的话说就是，贝林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美国历史的意旨和文化动力方面是过去50年里其他历史学者所无法比拟的。实际上，20世纪极少有像贝林教授这样在专业领域或者知识分子中影响如此巨大者。他没有去讨好更广大的观众，其工作纯粹是学术性的，对周期性地充斥于美国学术界中的一些思想跟风者他一直都是嗤之以鼻，对宁愿被人视为思想型的历史学者，而不愿做行动型的历史学者的那些历史学者（those historians who would prefer to be viewed as intellectuals rather than working historians）不断批评。

作为一名杰出的知识传授者，他开设的长达一年的美国殖民历史课程非常受学生欢迎，学生们通常都是一直鼓掌到最后一堂课。像这样有感召力的学者，在现今的美国史学界着实少见。贝林的学生们一谈起老师主持的殖民历史研讨课都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教诲学生们要力争做一名行动型的历史学者，对待研究项目要严肃认真。贝林的课堂有些与众不同，他上课一再强调真正的历史学者不要太关注于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样子，而应该关注为什么过去的某一部分内容后来被另一部分内容所取代。例如，有关教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关系（church-state relations）的激进的新设想是否曾经在北美诸殖民地出现过？为什么不列颠的土地所有之惯常做法，包括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primogeniture and entail）却没有能够移植到北美殖民地呢？为什么美国革命会发生在那些于当时世界来说是最为自由、人口最发达的北美殖民地呢？为什么美利坚人对宪法本质的认识与不列颠人的认识存在根本上的分歧呢？等具有启发性的问题。

然而，贝林的主要影响不是来自于课堂，而是他献给人们的著作。他的高足戈登·伍德10年前曾说过，“在当代几乎没有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能够像贝林那样在过去30年内一直在美国早期史这个特定研究领域占有主宰地位。”“通过他的独特研究视角，他给我们重新绘制了一张详尽反映美国早期史的历史知识地图，并且极大地拓展和加深了我们对美国殖民过去的理解。”这一溢美之词是他在美国革命研究领域成绩的真实反映。牛津大学杰出的历史学者J·R·波尔（J. R. Pole）这样评价贝林教授：“跟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相比，他更多地影

响了我们美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的思考方式。”贝林教授学术生涯最让人觉得惊奇不已的方面是他宽阔的研究视野。但是，贝林不能够被列入思想史学者行列。他的第一本著作是《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1955年）（*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该书对新英格兰商业精英阶层在当时的经济与社会角色做了具有想象力的考察。接下来的一本书是《1697年～1717年的马萨诸塞航运业：一种统计学的研究》（*Massachusetts Shipping, 1697～1717: A Statistical Study*），该书展现了贝林教授对后来被人们所认识的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8〕}的熟知。他的《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需求与机遇》（*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eds and Opportunities*）（1960年）对殖民时期北美的教育研究具有革命性意义。1968年，贝林教授推出了《美国政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该书对殖民时期政治的社会起源进行了卓越的研究，这本书奠定了他美国无可争辩的、首屈一指的社会历史学家的地位。1974年，贝林教授出版了《托马斯·哈钦森的苦难历程》（*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该书是对美国革命时期亲英分子描述最为成功的一本传记作品，也是过去30年中最为成功的美国传记作品之一。12年后，贝林教授因为《渡海西行的人：革命前夕美利坚人口定居中的一次迁徙》（*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一书获得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普利策历史奖，这本北美移民方面的历史巨著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口定居》（*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都是任何对18世纪殖民地人口迁徙运动感兴趣者的起点读物。在写作这两本著作时，他还对殖民时期的一些突出人物进行了系列传记描述，其中的若干传记性作品还收录到了他1990年推出的选集《革命的多面性：美国独立斗争中的人物和主题》（*Faces of Revolution: Personalities and Themes in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贝林教授除了在美国殖民历史方面推出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外，他还发表了许多阐述历史学者历史使命方面的评论和小品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1985年推出的小册子《历史与创造性想象》（*History and the Creative Imagination*），该书分析了对四位杰出历史学者罗纳德·赛姆（Ronald Syme）爵士，佩里·米勒

〔8〕从方法和技术的角度来说，计量方法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结合起来就有了“计量历史学”这一历史学研究的新路径。计量方法和电脑技术的采用，使历史学研究在定性分析之外，增加了定量分析的手段，提高了结论的精确度。有人甚至极端地提出，计量历史学将会成为惟一科学的史学，而那时历史学家就像计算机的程序员一样只需对各种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就可以得出很多不同凡响的结果来。美国历史学者在运用计量方法研究选举、移民史、经济史等方面走在世界史学界的前列，他们的研究使过去很少为人们注意到的教会登记、家庭账册、选举记录等资料所蕴藏的史料价值不断显露出来。

(Perry Miller), 查尔斯·麦克林·安德鲁斯 (Charles McLean Andrews) 以及刘易斯·纳米尔 (Lewis Namier) 爵士的创造性历史想象进行了分析。有人给贝林教授封了各种头衔, 说他是一名经济史学家, 社会史学家, 计量经济史学家, 思想史学家, 传记作家, 评论家, 以及史料编撰学者等不一而足,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贝林教授是当代美国最求新求异而且最富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尽管贝林教授已至耄耋之年, 但是他仍旧是壮心不已, 2003 年他还推出了《开辟一个新世界: 美国建国者们的天才与矛盾》(*To Begin the World Anew: The Genius and Ambiguitie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9]。2005 年贝林教授还推出了《大西洋历史: 概念与轮廓》(*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10] 一书。这两本专著已经在历史学界引起广泛热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 Amazon.com 以及其他电子媒体资源上看看读者以及专家们的评论。

三、对本书的简要评述

因为《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一书, 贝林教授获得了他一生之中的第一个普利策奖和班克罗夫特奖。之所以获得如此褒奖, 肯定有其独到之处。以往有关美国革命的书籍大多是描述当时发生了些什么, 这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但是很少讲述这些事件发生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尽管有那么一些著作对此分析, 但是都显得过于乐观, 或者失之于肤浅, 因为要讲述革命发生的背后原因是一种挑战, 而本书恰恰讲述了革命背后的“思想”斗争。本书在过去 50 年里是美国革命研究方面当之无愧的最重要著作, 并且毫无争辩是 20 世纪美国思想史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贝林教授的高足杰克·雷克夫 (Jack Rakove) 曾写道: “自从查尔斯·A·比尔德 (Charles A. Beard) 1913 年推出了《宪法的经济解释》(*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11] 以后, 已经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使有关美国历史方面的著作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了。但是比尔德的解释性冲击却掩盖不了其研究的匆忙、草率, 使得瑕疵毕露, 而贝林的《美国革命思想意识渊源》一书却拥有诸多有分量的原

[9] Bernard Bailyn, *To Begin the World Anew: The Genius and Ambiguitie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published by Alfred A. Knopf, 2003.

[10] Bernard Bailyn, *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 《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由查尔斯·比尔德于 1913 年推出, 该书用阶级冲突观念来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 堪称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巨著之一。在该书中比尔德指出, 美国宪法并不是由一些拥有智识和理想主义的公正人士所创造出来的法典; 它是由少数地主富商阶级所创造的产物, 旨在建立强势的中央政府, 以确保他们自身及富裕阶层的既得利益, 使其免于遭到多数民众侵害; 那些创立新政府的人的初衷就是要限制民主的发展, 等等。在他的一系列著作, 尤其是 1927 年推出的《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一书中, 比尔德更加清楚地说明了他所提出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斗争史。他在著作中不断指出, 在人类的行为选择中, 经济因素一直扮演着决定性角色。比尔德把他的进步主义思想和经济决定论结合起来, 清楚地向人们表明, 他同情民主势力和人民大众, 反对反动势力和特权。

始资料,从而使得该书在新的世纪里仍旧能够保持其权威性。”^[12]

对于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本质上该如何解释在过去存在很多不同看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学者发表了不同意见,例如,“和谐派”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特(Daniel Boorstin)在《美国人》(*The Americans*)中提出过一种保守观点,即美国革命只是殖民地人士为了保卫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由社会秩序,整个美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没有思想动因的说法;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曾经指出:从1763年起,大英帝国着手遏制北美诸殖民地,而殖民地人士在捍卫其权利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原则性和一贯性。但是贝林教授通过思想意识概念的利用为这一观点增加了一个崭新的、有力的元素。其实早在1965年,贝林教授就编辑出版了《美国革命的小册子,1750~1776》(*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50~1776*),该书通过对独立革命前夕在诸殖民地广泛流行的大量革命小册子展开研究,使得贝林教授坚定了他长久以来的一个观点,即美国独立革命不是在社会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政治和经济斗争,而是一场激进的思想意识上的斗争。正如贝林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样,他对英国女历史学家卡罗琳·罗宾斯(Carolina Robbins)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些借鉴,将殖民地思想意识的根源进一步追溯到17至18世纪英国激进辉格派思想家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亨利·内维尔(Henry Neville)、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等人的“辉格派思想”以及各种古典范例、欧洲启蒙运动、洛克的自然权利哲学、英国普通法原则、清教主义和圣约神学理论所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13]另外,贝林教授也认为,从北美殖民地人士对英国政策的回应来看,他们同时也从植根于17世纪英国共和时期强大的思想和政治异议中吸收了很多其他东西,例如对政治抱着一种固执和怀疑的态度,从而强调手握权力者(集中的权力)通常会对民众的权利进行威胁。^[14]因此,殖民地人

[12] Jack Rakove, *Bernard Bailyn: An Appreciation*, cf: <http://www.neh.gov/news/humanities/1998-03/rakove.htm>. 本节有部分内容参考了该文。另外,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贝林教授除了非常擅长从当时的政治小册子中挑选一些特别的片断作为他分析的支撑素材之外,他所发掘的原始资料往往使读者能够崭新地认识到当时的某些小册子作者们思想中的闪光点,特别是他从一些学术刊物,如《威廉和玛丽季刊》等里面所挖掘出来的史料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13] 贝林教授在本书中通过对西德尼、弥尔顿、特伦查德、戈登、博林布鲁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等诸多重要思想者的思想观念进行引证,推翻了以往的传统解释,即强调是洛克的思想对美国革命产生了根本影响这一说法。尽管如此,贝林教授和其他一些近代学者一样没有否认洛克自然权利哲学的中心地位。相关内容具体参见本书第一、二章对革命文献的发掘以及对渊源和传统的阐述。

[14] 在“权力与自由(Power and Liberty)”一章,贝林教授对革命前期思想观念的演绎非常特别,因为他把每一场政治争论的最终解释落脚在对权力的最终部署上。“权力”被其定义为一种“支配和控制”或者说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人的驾驭。通过数十个鲜活的例子,贝林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权力对于自由的维持来说是根本的,但是当权力超越了合法边界的时候,这种失去控制的权力又是极其危险的。

士没有把英国首创的一些东西视为诚实的错误 (honest mistake) 或者估算错误 (miscalculation), 他们预先就倾向于把英国人错误解释成正在筹划一种系统阴谋, 这个阴谋旨在把善良的美利坚人民变成英国人的政治奴隶。对此, 贝林教授最后总结指出: 美国独立不是因为美利坚人民在坚守其原则, 而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意识, 这种思想意识虽然经常处于接近执着中的妄想状态, 但是它却推动殖民地人民不断走向革命。

为了讲述这个思想意识的来龙去脉, 该书用最后两个结论性章节、将近半本书的篇幅来描述这一过程。在这两个章节中, 贝林教授对美国革命中的激进主义进行了更为复杂的解释。^[15] 他指出, 这种激进主义更深层次的重要性植根于它对那个时代已接受政治智慧的一种根本性挑战。在《印花税法》颁布后 10 年间所发生的“激荡争辩”引导殖民地人士对代表、主权、权利以及宪法的本质等类似概念进行重新定位并赋予新的内涵。在演绎殖民地人士这些立场的时候, 作者向人们暗示, 美国人民要逐渐认识到他们所要竭力模仿的母国文化与他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多么的不一样。如今, 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来看, 美国人民会认识到其先辈们早就已经通过大胆而又渐进的方式脱离了欧洲旧世界的条条框框了。有一些人可能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新共和国应该走得更远, 继续发挥革命推动力的作用对权力的其他的渊源——已得到确认的宗教、奴役制度、社会等级制度等那些在 1765 年还没有成为争议的问题发起挑战。

本书最后一章“实现 (Times New Romans)”是贝林教授在修订本书时新增加的内容, 集中探讨了制宪会议以及联邦主义者 (Federalist)^[16] 与反联邦主义者 (Anti-federalist) 之间所发生的争论; 为了证明他的结论, 他明智地选择了革命人士及其反对者所发表的一些思想独特的意见和看法。在该

[15] 其实在第三章“自由的蔓延 (The Contagion of Liberty)”中, 贝林教授就巧妙地用这个标题表达了革命时期新思想的发展, 直到权利和自由观念的扩张已经远远超出了革命一代已接受的思想范畴。这些新的思想包括对奴役制度的抨击, 置疑宗教的确立, 把民主想像成一种合法的以及潜在稳定的政府形式, 并且不断强调政治平等实现之后社会平等也会实现。正如贝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对这些主题的思考 and 写作将 18 世纪知识分子的世界与麦迪逊以及托克维尔的世界连接了起来。

[16] 本书中译者认为把 Federalist 以及 Anti-federalist 译为“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较为妥当, 而约定俗成的译法“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欠妥当。因为在美国历史上, “Federalist”一则主要指那些 1787 年到 1789 年支持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政治家和公众人物, 他们所开展的运动后来体现在《联邦主义者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当中; 二则指支持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政府的那些政治家和公众人物, 但是还称不上是一个联邦党 (the Federalist Party), 因为联邦党作为一个政党, 它是短命的, 1791 年才出现, 1825 年消亡, 持续时间仅 34 年。“反联邦党”一说则更是没有根据。对于这两个词译法的争论建议读者先查阅 <http://www.answers.com/topic/federalist>, 然后再参考尹宣: “是《联邦党人文集》, 还是《联邦主义文集》?”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culture/200610260032.htm>。但是笔者不支持把 the Federalist Papers 译为《联邦主义文集》, 理由很简单, 因为“联邦主义”在英文中另有“federalism”一词来表述其内涵。

章结尾处，贝林教授让美国革命中那些亲英派反对者说了最后一席责难之词。在这些亲英派反对者看来，革命人士对其权利的大声疾呼赤裸裸地隐藏了他们必须奋起抗议的无政府主义结果。有鉴于此，这些亲英分子最后警告道，任何形式的权威，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固定的，从此以后都不会让人感到安全。但是，贝林在该书感人至深的结尾处开诚布公地指出，未来理所应当由革命人士来决定。至此，聪明的读者应该不会怀疑贝林对革命人士以及他们“拒绝向任何独裁的权力屈从”的行为是满怀深情的。

涂永前

于蓟门桥陋室

增订版序言

回想萌发创作这部著作的念头开始，到现在算起来大约有 30 年了，我仍然能够想起刚开始研究美国革命中的诸多思想意识主题时给我带来的极度兴奋以及发现快感（the sense of discovery）。我本人以及那些与我分享了这份兴奋的人们，如果把启蒙运动中产生的那些老生常谈搁置一边，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思考革命运动中的领袖们实际上说了些什么，他们的观念到底从何而来，这些观念是如何连贯起来的，以及尽管这些观念源于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但是它们是如何明确有力地表达了北美的独特情况等问题时，我们都会为当时那些广为人知的、居于主流地位的一系列观念、信仰和态度而感到惊讶不已。这些发现产生于对历史的一种深刻语境主义研究进路（a deeply contextualist approach to history）——沉浸在一个久远年代的详尽情节之中，并努力去探询那个革命领袖们曾经生活和经历过的世界，而非那个预见了未来的世界。

从这种语境出发，我们会清晰地发现美国革命中出现的思想意识是对那个时代而言极端激进的各种观念与信仰的混合，即使到今天，它们仍然是隐约有些偏激的。事实上，这部著作第一次出版时，我给它取的书名是《美国革命中的转型激进主义》（*The Transforming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并在第六章“自由的蔓延”中，具体对这个主题的启示作了更广泛的解释。“美国革命中的思想意识”这个语汇有很多来源，但主要受一种独特的英国政治思想主导。这种思想意识是各种信念的集合，它集中于努力使个人从压迫性权力的滥用中，从国家专制中解放出来。但是美国革命的发言人们——也就是那些小册子作者、随笔作者以及形形色色的评论人士——他们不是哲学家，他们也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活跃的政治家、商人、律师、种植园主和牧师，他们也没有打算使他们的观念同现代学者所宣称的那些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史上的大人物的观念保持一致。他们没有想过要把自己扮演成“世俗人文主义者（civic humanists）”，因此在试图书写他们的思想特征时，我也不打算那样描绘他们。因为，他们要是听到后人把他们的观念井然有序地归结为政治观念史中的某种类型，肯定会惊诧不已。他们认为，任何政治制度，当然包括所有共和政体在内，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以德性（virtue）为基础；但是他们对普通人的德性不抱有幻想，而且他们都对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保护及促进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那些基

2 增订版序言

本价值深信不疑。这些人既是“世俗人文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尽管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情景下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确，正是其思想的灵活性以及可以与主旋律融为一体的复杂变奏曲被证明是后来的革命思想意识研究中最令人难忘的成果。从一开始，各种原初观念和信仰所表现出来的是它们的凝聚力（force and cohesiveness），而不是它们面对变化的需要及情况时所具有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适应性（adaptability）以及灵活性（resilience）。这些特点在1776年以后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并且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人们可以详细地检验这些观念与那些新出现的以及不同的问题之间的冲突。

vii 在初始阶段，这些小册子的作者们努力仔细思考并利用他们所继承并且最为珍视的那些观念——也是本书的主题，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海外的腐败以及他们在国内所面临的各种严重政治危险上，并且下结论认为他们已知晓的自由的永存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去摧毁那些迄今为止统治他们的政治与宪法制度。在接下来的阶段——按照渐进性原则（progressive principle），改革独立各州的公共事务，他们借鉴了以往通行做法中明示的或默示的各种观念，这些观念同他们极为熟悉的、不主张民族国家（nation-states）权力的小规模政府进行自由化涉及的技术问题有关联。最后阶段——考虑到革命前多年的主要关注点，对许多人来说，它似乎是荒谬的——是建立一个具有巨大潜在权力的、崭新的全国性政府，这个政府将统治一个多元的共同体，并且以前它仅孱弱地存在于战争的绝望之中。但是要建立这样的民族国家以取代近来才刚刚挣脱的权力制度（power system），这种做法好像与革命发言人已经创设的思想意识革命的方向相左。要确信这种情形没有发生，他们必须返回到其思想意识的源头，重新思考引导他们投身革命并在革命过程中得到广泛适用的那些原则，并且将这些原则进行提炼和现代化改造，以便在新形势下重新利用这些观念。最后，他们终于发现，自己通过创设权力——根据新原则——而不是靠摧毁权力实现了他们最初的目的。

viii 为了探究美国革命思想意识的结论性阶段（在此阶段原初观念的各种可能性得到了深入探索和大胆运用），我已经通过增加“跋”的方式扩充了原版，这个“跋”主要涉及在联邦宪法行将批准时所产生的广泛的、无序蔓延的、极具争议的各种论争。正像原著是基于对那些从事革命的人的全部著述的审查一样，这个“跋”也是对浩瀚文献进行深度解读的结晶，这些文献资料包括无数的报纸片段、个人书信、国家文件以及在宪法获得批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赞成和反对的言论——它们均产生在联邦宪法前途未卜的那段动荡岁月。

这场由每个共同体和具有政治意识的个人参与的全国性大争论，是此前已经发生的每一事件的续篇和随之而来事件的前奏。但是，这种产生于斗争的新国家权力体系，并不标志着我们国家起源的思想意识历史的突然中断。决定革命思想

意识起源的那一整套强有力的各种观念、理想、政治意识以及早期革命的发展，不会因为联邦宪法的问世而死亡。在我看来，该宪法文件并不标志着热月党人对早期理想主义的反动，尽管这种理想主义要么得到了资本主义军人执政团的推动，要么得到了有闲贵族阶级的支持者的推动；《联邦主义者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10篇论文的面世既不标志着早期政治信仰的破灭，也不能标志新政治学的突然导入。针对各种基础学说所做的修正必须使它能够适用于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这些基本的信仰需要经过检验、提炼、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及灵活再运用——但是这么做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些信仰。当然，联邦宪法创设了一个潜在强势的中央政府，并赋予了其更好地服务于一定经济利益集团的权力，而且这个新政府还会拥有一些反联邦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也是革命旨在摧毁的那种独裁、极端以及集权的专制权力。然而，事实上，正如几乎所有反联邦主义者迟早都会认识到的那样，特别是在有了《权利法案》保驾护航之时，我们的联邦政府并不像他们先前所描述的那样独裁、极端和集权。那些早先的原则继续存在，它们尽管已经换上了新的、更加复杂的形式，并且已经嵌入新制度，但是它们已经使得那些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传统永存于现代世界。18世纪革新的根本精神——是其理想主义，以及使所有个体从国家（即使是一个经过改造了的国家）权力中解脱出来的决心——这些精神将会继续存在，并将依然存在。

伯纳德·贝林

1992年